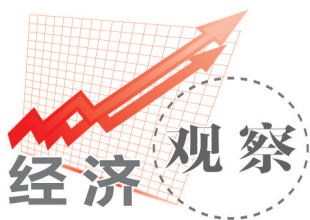




以体制改革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 李 鹏



展壮大的舆论氛围、发展环境和信心预期。

着力营造公平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形成加快高质量发展的激励性经济社会氛围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企业和专家座谈会时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其中,明确提出健全推动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未来五年我国经济要在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实现新的全局性突破。当前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主题,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更好相适应。

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更多经营主体迈向世界一流企业

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激励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加快民营企业转型升级,促进更多经营主体迈向世界一流企业,使各类经营主体成为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主攻手”和“领头羊”。

一方面,积极推进公有制经济领域的改革。积极探索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加快培育乡村振兴的多元经济主体。相关部门要以提高核心竞争力为重点,按照行业分类、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明晰、市场化机制运营原则,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完善国有企业现代公司治理机制,使我国国有企业尤其是关键领域、重要行业的国有企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

另一方面,加快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落地生效。积极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少参与、不干预市场经营活动,让企业自主决策,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党委政府职能作用,主动为民营企业 and 外资企业解难题、办实事,切实依法保护非公经济产权和企业家长利益,形成真正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和民营企业发

加快形成有利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创新体制,夯实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

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要持续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

首先,加快构建科学技术进步形成机制,促进技术革命性突破。一方面,打造科学技术现代研发平台机制。科技进步高度发达的今天已经不同于传统农耕时代和工业化时代,一流的科研成果有赖于一流的实验室,围绕重大战略需求、现实重大问题,建设国家、区域性科研院所和企业重点实验室,将其打造成为融合各类现代要素公共研究平台。另一方面,构建科技成果转化现实生产力的生态系统。科技成果还不是现实生产力,需要完善市场转化机制,加快构建实体和虚拟的科技成果交易市场;对于孵化期的新技术完善和鼓励风险投资,促进其形成未来产业;利用互联网的力量,着力构建集“产学研用金”于一体的问题发布机制、赛马破解机制、金融支持机制。

其次,构建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机制,着力提升全要素生产效率。从企业对生产要素的配置机制看,要加快生产要素从人工计划转变为智能计划。曾经依靠人工计划的企业内部资源配置不可能十分精确,而在智能化时代,智慧工厂、智慧车间将依靠人工智能,实现时间上的继起性和空间上的并存性,各个环节实现无缝对接,有效加快了资本等各种生产要素的循环周转速度和效率。从区域生产要素配置来看,要加快生产要素从地区分化转变为功能互补。在自由竞争机制作用下,更多的生产要素配置在城镇特别是大城市容易出现地区分化现象。而在智能化时代,通过政府引导+市场机制,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合作更多带有互利互惠性质,不仅有利于促进欠发达地区发展,也有利于发达地区拓展市场空间并实现区域功能的互补。

最后,培育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机制,加快生产力向更高级产业形态演

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主要依靠大规模科技创新推动,意味着与传统生产力升级机制和路径会有显著差异。一方面,要激励发挥创新型企业家这个主体来组织创新生产要素,由创新型企业家来引领推动产业迭代发展和新兴产业的形成。另一方面,要考虑政府与市场功能的重新定位。不同产业领域新质生产力形成有着明显的路径差异,“从1到10”和“从0到1”都包含新质生产力,但所需要的政府政策支持体系是不同的。产业政策转型作为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关键路径,尽管在新质生产力形成中,市场应该发挥决定性作用,但有效市场对政府职能转变提出了更高要求,政府不仅要以科技创新促进传统产业升级,更重要的是如何准确发现、界定战略性新兴产业,有效识别、培育未来产业。

扩大制度型开放,增强以新发展格局促进高质量发展的稳定预期

开放型经济体制本质上就是促进和保障商品、要素和服务在国际市场上自由有序流动,逐渐形成稳定的生产和消费国际化的体制机制和制度安排。

首先,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市场规则体系,带动提升国内市场体系的开放、竞争、全球化程度,提高依法依规高效解决涉外问题的能力水平,借助国际规则增强国内规则的协同效应能力,以国际市场带动国内市场体系的完善。

其次,深度清理与外商投资法不相符的政策文件,全面检视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情况,在产业政策、资质许可、上市融资、合规补贴、服务价格等方面,保障外资企业依法平等参与政府采购、招投标、标准制定。

最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和重构,注重提升国际规则国内化和国内规则国际化的一体化程度,为全球治理提供高质量的中国方案和公共产品、突破逆全球化的发展瓶颈、引导全球多方力量,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国际经贸投资新秩序和新规则。

推动服务型消费提质扩容

□ 解 晋

消费既是生产的目的和动力,也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对经济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当前,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其中,服务型消费潜力不断释放,成为当前消费回暖的主动力量。2023年全国人均服务型消费支出超过1.2万元,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45.2%。今年第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服务型消费支出同比增长12.7%,比居民整体消费支出增速高4.4个百分点,表现出对整体消费的巨大拉动和支撑作用。发掘服务型消费巨大潜力,打造服务型消费发展新动能,对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具有重要意义。

服务型消费,与实物型消费或物质型消费相对应,其市场交易和消费的对象为无形服务而非有形实物。居民服务型消费主要包括餐饮服务、衣着鞋类加工服务、居住服务、家庭服务、交通通信服务、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医疗服务等形式。推动服务型消费提质扩容是当下释放我国消费潜力、拉动国内需求的重要抓手。从发展水平看,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消费升级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消费需求从“有没有”逐渐转向“好不好”,对获得感、幸福感和生活品质提出更高要求。服务型消费所强调的发展型、舒适型、享受型消费特征与需求结构升级的方向高度契合,能够满足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从人口结构看,我国老龄人口占比不断提高,所伴随的家政、健康、护理等生活服务需求更加迫切,“银发经济”正加速发展。从发展特征看,我国消费结构升级与数字经济发展形成交汇并深度融合,大数据、云计算、虚拟现实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业发展,推动服务业线上线下交融和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催生数字健康、数字教育、智慧餐饮等服务型消费新形式、新内容、新场景,更好满足和创造多层次、个性化、多样性的服务型消费需求。顺应居民消费升级趋势,推动服务型消费扩容提质,有利于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发掘和释放消费潜力。

除直接拉动增长外,服务型消费还通过其他路径间接促进内需,对经济增长起到牵引带动作用。从行业特征看,服务型消费具有明显的“接触”特征,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型消费扩张有助于吸纳更多劳动力就业,从而完善分配结构,促进“派生”消费。从供求规律看,生产的目的是赚取利润,途径是满足需求。因此,消费热点往往备受投资青睐,成为投资“焦点”。服务型消费扩容提质将拉动服务领域投资,拓展增长空间。从服务型消费和实物型消费间的关系看,服务型消费和实物型消费并不是“去一存一”的矛盾和替代关系,而是有着辩证统一、相互促进的内在关联。实际上,实物型消费是服务型消费的物质依托,实物型消费需要服务型消费的配套,服务型消费提质扩容也将有力促进实物型消费。比如,康养行业的发展显著带动了营养品等实物型消费;而高品质营养品供给也将进一步促进康养行业的繁荣。以服务型消费扩容提质统筹、牵引实物型消费,有利于形成服务型消费和实物型消费共同发展、相互促进的内需扩大新局面。

但同时也要看到,服务型消费提质扩容面临着不少挑战。一是有效供给不充分。从供给结构看,高端服务产品供需矛盾突出。医疗康养、职业教育、心理咨询等领域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不足,服务质量不能满足消费需求,部分消费流向国际市场。从供给规模看,服务行业总体供不应求,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养老、家政、陪护等重点行业普遍存在人才缺口及“用工荒”现象,消费门槛较高。二是行业标准不健全。服务业新场景、新业态不断涌现,但行业标准和制度建设滞后。各从业机构在用工要求、服务内容、服务流程、费用收取等方面缺乏全国统一标准。服务质量参差不齐、消费者权益难以保障、行业监管和惩戒机制缺失等矛盾凸

显,行业环境有待改善。三是平台建设不完善。平台是供需双方发布和获取供求信息、选择交易对象、完成支付结算等交易环节的主要依托和市场实现的主要形式,对规范行业发展、完善市场机制、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至关重要。交易平台建设不完备导致信息壁垒和交易成本提升,抑制市场效率。尤其是从业人员业务能力和个人信用等重要信息不对称,价格的信号作用和市场竞争机制受到制约,影响了行业发展。

推动服务型消费提质扩容,关键是瞄准服务业发展面临的痛点、难点,有的放矢打破制约服务型消费的瓶颈,释放服务型消费增长新动能。一是丰富高品质服务供给。探索产教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推动政府、高校、行业协会等多方合作,发挥多方优势,聚焦行业特征,订单式培养高素质服务人才。加大金融、财政、税收等政策支持,引导服务业企业针对细分行业 and 具体场景打造特色服务产品。鼓励服务业企业组织化、规范化、规模化发展,打造专业化、连锁化、品牌化经营模式,推动服务业企业高质量发展。二是出台统一标准,规范行业发展。政府部门牵头,会同行业协会,围绕岗前培训、岗位要求、服务内容、质量评估、费用收取等方面制定、出台国家标准。推广使用服务业合同示范文本,公开服务项目和收费标准,明确服务内容清单和服务要求。完善服务型消费售后投诉和纠纷解决机制。三是建立信息平台系统,汇总服务业企业、服务业从业人员、消费者基础信息。建立服务业从业人员个人信用数据库,记录、跟踪、管理服务行业从业人员个人信用和从业评价。推动服务业从业人员身份认证、信誉核查、信用报告等信息公开,降低市场搜寻成本,为发挥市场的竞争机制和“筛选”作用创造条件。探索内、外部监督相结合的平台监管机制,建立对违规、失信服务业从业人员和从业企业的处罚和约束机制,推动服务业规范发展。



深化改革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赋能

□ 唐明良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先进生产力质态。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改革作为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的重要调节方式,在新质生产力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变革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立良法,为新质生产力发展供给优质的制度设计。法治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保障。要强化科技创新、数据要素、知识产权等领域的立法。在立法过程中,按照“良法”的目标来定位,尤其需要突出规则设计的平衡性、改革味和冗余度。立法要在发展新质生产力面临的矛盾焦点上“划杠杠”,新兴领域的立法,在对准焦点的同时,也要留白,提供发展空间。以数字领域的立法为例,从国际上看,当前已有很多数字立方案例,如数字服务法、数字市场法、数据法案等,其中有不少可借鉴的制度设计。但对于部分立法,在理论和实践中也

提出了是否会减少创新甚至抑制创新的疑问,需要妥善权衡,这也为我国相关立法提供了一面“镜子”。新兴领域的立法,很多事项和规则设计是决断于未知之中,尤其考验立法者智慧和立法科学,需要完善立法体制机制,为优良的制度设计适配科学的立法程序,集思广益提高制度建设质量。

善治理,为新质生产力发展配置规范的监管政策。新质生产力所涉及的领域和产业,许多是想象不到、规划不出来的,尤其需要体现执法监管中力度和温度的平衡。同时,要以预防型法治的理念处理好“合规引”和“违法惩”之间的关系,把更多的执法监管力量用在前端合规指引,促进规范有序健康发展。面对新质生产力,传统的适用于旧的生产力质态的执法监管政策工具箱往往不敷使用,需要积极创新,引入更多新的政策工具。如深化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包容审慎监管;对未来产业实施更多的“沙盒”监管(划定相应范围),对“盒子”内的企业或对象,采取不同于传统产业的包容审慎监管措

施;对一时看不准、短时间内专门立法时机不成熟的,需要试点探索前端合规指引,让经营主体提前知晓法律的底线和红线。当然,对于触碰法律底线、违法犯罪侵害市场秩序和公共利益的情形,需要严格执法、依法惩治。

促改革,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划定政府与市场的合理边界。全面深化改革是变革生产关系的重要途径,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这些体制机制改革目标的实现,需要法治来加以确认和保障。需要指出的是,新质生产力是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共同培育和驱动形成的,因此,该领域改革的关键仍然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如何在科技创新要求下,积极推动政府、市场、社会协同发力;如何在推动短板产业补链、优势产业延链、传统产业升链、新兴产业建链中发挥好“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的作用,

既让政府在这些领域比过去更积极有为又不突破基本的边界。这是十分关键的新课题,需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不断固化改革成果、破解改革难题、预留改革空间。

稳预期,为新质生产力发展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法治发挥的作用是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对于经营主体而言,能稳定其预期、巩固其信心的营商环境就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新质生产力因其“新”,必然带有某种前沿性、不确定性和风险性,营商环境的可预期性对其信心尤为关键。为此,需要在市场准入、要素配置、政策支持等方面增强公平性、透明度和可预期性,既要“给优惠”,更要“给机会”。同时,对于新质生产力中的“新劳动者”,也要为其积极探索不同于传统产业的合法权益保障机制。此外,基于新质生产力的特征,对一些需要保持战略耐心的领域,将宽容失败予以制度化明确,激励创新者吃下“定心丸”;对于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政策创新试验,需要依法依规实施容错免责。